

埃及海外科普特人对母国的影响研究*

任 敏

内容提要 科普特人是埃及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群体。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纳赛尔国有化经济政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科普特人开始向西方移民,并在埃及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科普特离散社区。迄今为止,埃及海外科普特人呈现出亟待关注的群体性特征:从人口构成来看,主要以文化知识水平高、专业技术能力强的男性中产阶级为主;从离散目的地来看,大部分海外科普特人主要寄居在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家,另有少部分在阿拉伯海湾国家和中国等地工作、生活;从离散方式来看,海外科普特人所到之处纷纷建立了科普特教会以维系身份认同和跨国联系;从离散类型来看,科普特人在国际迁徙中形成了文化政治型和经济交往型的离散群体。海外科普特人虽身居异国他乡,但对母国埃及各领域事务的关注、参与和影响从未停止,他们一方面通过侨汇、投资、慈善捐赠和旅游与埃及建立经济联系,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游说参与埃及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海外科普特人通过社团组织向埃及社会输送新的思想观念,进而推动母国埃及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交流与更迭。

关键词 科普特人 埃及 离散族群 母国

一、“diaspora”的定义、译法与界定

“diaspora”是由希腊语“dia”和“speiro”组合而成的复合词。最初,“diaspora”专指诸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受害者”群体,暗含了一种悲怆与返回(想象中的)故土之意。^① 20 世纪末随着 *diaspora* 杂志的创刊,学界关于何为“diaspora”^② 达成大体一致的共识:现代意义上的“diaspora”在跨国移民浪潮的裹挟之下,具体指拥有共同民族起源与历史记忆的少数群体,居住在母国外却又维持与母国的多重跨国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母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影响。其重点在于虽分散而居,却与母国社会建立某种联系。自 21 世纪以来,面对流动性越来越强的全球社会,学界开始注重“去域化”的全球“diaspora”,逐渐将“diaspora”研究与跨国主义交

* 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阿拉伯学术史经典著作《目录》的翻译、注释与研究”(20ASS00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 1, no. 1, 1991.

② 关于“diaspora”的释义与分析详见以下研究成果: Gabriel Sheffer, “A New Field of Study: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8, 1986;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 1, no. 1, 1991;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9, no. 3, 1994;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8.

织在一起。^①许多移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久住寄居地的古典“受害者”群体,而是具有较强流动性的跨国群体,他们既保持着居住国的身份,又维持与母国的多重联系。一言以蔽之,学界关于“diaspora”的研究从充满悲怆的背井离乡转向了移民带来的正面影响,现代意义上的“diaspora”更多意味着一种跨国生存、跨界联系和世界主义的积极维度,其所指涉的群体范围逐渐扩展至各个行业的移民社群。

“diaspora”作为外来词始于西方国家,关于“diaspora”的译法问题,我国学界常见译法有“流散”“飞散”“离散”等。我国学者朱敬才将“diaspora”译为“流散”,强调其在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跨境生存的常态化现象,即该群体的主要特征为“流动性”。^②童明将“diaspora”一词译为“飞散”,指任何在自己传统家园之外生活的人或人群。^③范可和张康等人将“diaspora”译为“离散”,其内涵在于与“母国”“家园”等意象紧密联系,并指出离散者与母国的关系如同物理学中的离心力和向心力,既不会一味靠近,也未曾渐行渐远。^④此外,陈志明将“diaspora”译为“流寓族群”,以强调其“流动”“寓居”跨国联系的特征,并关注在全球化秩序下离散群体与民族国家的关联与互动。^⑤笔者认为将“diaspora”译为“离散”为佳,旨在说明离散族群与其母国之间的活动关系。就此而言,全球化时代下的离散族群不能被视为“拔根”的,其与“故土”割不断的情感羁绊,又与“他乡”切不断的社会联结终究将其置于二者的跨国场域中,承担着即便生活在寄居国(hostland)却又兼顾着母国(homeland)的跨界责任。

聚焦埃及科普特人,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迁出地“推力”因素与迁入地“拉力”因素的合力驱动下科普特人开始向埃及海外迁移。在国际迁移中,科普特人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群体性特征,而且对母国埃及的影响日益凸显。具体来看,海外科普特人除了直接参与祖国回归运动之外,大部分科普特人在海外通过回应埃及政治生态、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与母国保持较为强烈的跨界联结,继而对埃及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影响。与此同时,海外科普特人规模的扩大,延伸了国内外学界对科普特人的研究范围,并将外迁埃及海外的科普特人称为离散科普特人(Diaspora Copts)。^⑥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关于离散科普特人的研究仅在相关文章中稍有提及,^⑦没有专门的著作或文章对其进行详细深入的考察。西方

① 将“diaspora”与跨国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有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Gordon and Breach Press, 1994;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 no. 2, 1999; Thomas Faist,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朱敬才:《流散研究的兴起及其基本动向》,载《社会》,2012年第4期。

③ 童明:《飞散的文化和文学》,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

④ 范可:《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载《思想战线》,2012年第1期;张康:《离散华人族群与祖(籍)国关系变迁述论》,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⑤ 转引自段颖:《diasspora(离散):概念演变与理论解析》,载《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

⑥ 本文所指涉的离散科普特人具体指自1952年以来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具有国际移民经历的埃及科普特人,他们虽在异国或归化或暂居或活动,却无意或有意地与埃及家乡保持着紧密的情感、物质、文化和政治联结,具有较为强烈的跨国性和流动性,总体上包含了科普特精英群体、留学生、劳工移民和各个行业的社群。因此,本文对于离散科普特人的界定并非以“国籍”为主要衡量因素,而是将其置于现代意义上的离散社群视域下考量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群体形态,以期更加全面地还原其发展概貌,同时避免将离散科普特人(Diaspora Copts)视为因埃及国内政治和宗教因素而被迫迁移的“受迫害者”的片面西方视角。

⑦ 我国学界关于离散科普特人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以下研究成果:张燕军:《中东国家建构中的少数民族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3期;陈天社、彭超:《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人生存状况及困境》,载《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段九州:《庇护主义视角下的科普特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段九州:《科普特问题和埃及宗教冲突的制度性根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3期;彭超:《埃及剧变后科普特人问题透视》,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

学界关于离散科普特人及其组织的研究比较深入,且水平较高。^①但有关离散科普特人的研究多以科普特人的寄居国为地理空间背景,考察离散科普特人及其后裔的社会适应与融入问题,较少有专门研究以离散科普特人的母国埃及为地理空间背景,关注科普特离散群体与埃及的联系和影响。有鉴于此,本研究跳出以往离散研究的寄居国视角,以母国埃及为背景,对离散科普特人的历史缘起、现状特征,以及对母国埃及的影响进行考察。

二、离散科普特人的历史缘起与现状特征

由于离散科普特人的流动性与分散性,很难追踪到确切的人口迁移数据,只能通过散见于文献资料和人口普查中的数据尽可能还原其历史演进与现状特征。

(一) 离散科普特人的历史缘起与演进

科普特人向埃及海外迁移始于1952年纳赛尔革命后。在纳赛尔统治下,埃及当局坚持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国有化的经济建设和以“纳赛尔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改革。对科普特人而言,包括埃及土地改革的大规模国有化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剥夺了科普特人的经济来源,挤压了科普特人的社会发展空间,对科普特人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纳赛尔的国有化改革在城市掀起了高潮,打击了由科普特人主导的诸如马加尔和摩根巴士公司,以及开罗银行等大型企业,损害了科普特精英阶层的利益,将上层社会的科普特人推到了向外迁移的边缘,导致科普特社区精英阶层最先移民。随即埃及社会出现了第一波科普特人向外迁移浪潮,这一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据估计,在1962—1975年间移居加拿大的埃及人为5427人,其中科普特人为4399人。同期,移居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科普特人分别为4789人和3314人。^②不仅如此,纳赛尔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国有化政策使处于中产阶层科普特群体的商业活动减少,职业机会受到限制。在国有化改革下,大部分科普特人的私营企业处于休眠状态,迫使数千名科普特中产阶级精英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时,在纳赛尔的政治改革下,埃及当局取缔了科普特人的政党,使科普特人在埃及政坛的影响力萎缩。此后,科普特人向海外的迁移持续不断。

萨达特执政后,强调埃及民族的伊斯兰属性,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埃及法律的唯一来源,加之科普特教会教皇及其继任者与埃及当局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科普特普通民众在埃及的社会地位直线下降,由此导致科普特人向西方的大规模迁移。据统计,1977年加拿大和美国的科普特人数达到8.5万人。^③1980年北美有9万科普特人,澳大利亚有2万科普特人,西欧也有较小的科普特社区。^④随着科普特人在西方社会的聚集,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散居海外的科普特人相继成立了科普特社团组织,发行科普特人的出版物,强调科普特人在埃及的“所有者”身份。与此同时,部分海外科普特人激进的政治活动导致其在埃及国内的形象逐渐“污名化”,埃及国内穆斯林将外迁西方的科普特人视为“西方社会的代言人”,使埃及国内的基督徒少数群体成为穆斯林潜在的攻击

^① 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关于离散科普特人的代表性成果有:Lise Paulsen Galal,“Guardians of Contested Borders: Transnational Strategies for Coptic Survival”, *Kvinder, Køn & Forskning* 2-3, 2007; Sallie Ann Boulos, *The Role of Acculturation, Ethnic Identity, and Religious Fatalism on Attitudes towards Seeking Psychological Help among Coptic Americans*, Texas A&M University, 2011; Pishoy Salama, *Of All Nations: Exploring Intercultural Marriages in the Coptic Orthodox Church of the GTA*, University of St. Michael's College and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Jennifer M. Brinkerhoff, Liesl Riddle,“General Findings: Coptic Diaspora Survey”,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Michael Wahid Hanna,“With Friends Like These: Coptic Activism in the Diaspora”, *Middle East Report*, 2013; Yvette A. Shenouda,“Planning for Coptic Immigrant Integratio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9.

^② Saad Eddin Ibrahim, and Ibn Khaldou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Cairo), *The Copts of Egypt,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96, p. 16.

^③ Saad Eddin Ibrahim, and Ibn Khaldou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Cairo), *The Copts of Egypt,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96, p. 16.

^④ J. D. Pennington,“The Copts in Moder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8, no. 2, 1982.

目标。

1982—2011 年,穆巴拉克总统与科普特教皇建立“新米勒特”的政治关系,将科普特人置于教会的保护之外,普通科普特民众被忽视,由此导致科普特人在职业、政治参与以及修建教堂等具体事宜中饱受歧视。因此,该时期科普特人向海外迁移仍在持续不断。2010 年,仅在美国的科普特人数量就达到 35 万人,加拿大为 15 万人。^①也有学者大胆估计,埃及海外科普特人数量远高于官方的估计数值,甚至高出所有埃及移民的人数。^②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各国,继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发生后,埃及社会爆发了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罢工等反政府活动,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活动也此起彼伏,导致“阿拉伯之春”以后科普特人向外迁移的浪潮。据统计,2011 年以后美国约有 20 万科普特人,加拿大约 5 万,澳大利亚 5 万,而科普特人组织宣称实际人数远不止此。^③ 此外,在科威特、英国、法国、南非等国家都存在少量的科普特人社团。

2012 年穆尔西通过民选上台,穆尔西执政意味着埃及结束了军方代管,使穆兄会登上了埃及政坛的顶峰。在穆尔西威权主义国家治理行动与穆斯林激进派的作用下,埃及社会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行动此起彼伏。据埃及媒体报道,2012 年穆尔西执政时期穆斯林与科普特人暴力冲突事件达到 112 起。^④ 更为重要的是,穆尔西当局无法解决前任遗留下来的经济发展症结,造成该时期埃及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科普特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部分科普特人离开埃及故土寻求“庇护所”。据估计,2012 年居住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科普特人数量为 53.3 万,但还有学者估计在美国的科普特人就有 60 万人。^⑤

表 1 1962—2012 年居住在西方国家的科普特人口数量^⑥

时间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
1962—1975 年	3314 人	4399 人	4789 人	
1977 年	加拿大和美国共 8.5 万人			
1980 年	加拿大和美国共 9 万人		2 万人	
1990 年	16 万—18 万人			
2010 年	35 万人	15 万人		
2011 年	20 万人	5 万人	5 万人	
2012 年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共 53.5 万人			

① Saad Michael Saad, “The Contemporary Life of the Coptic Orthodox Church in United States”,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vol. 16, no. 3, 2010.

② Jennifer M. Brinkerhoff, “Diaspora Philanthropy: Lessons from a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Coptic Diaspora”,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 43, no. 6, 2014.

③ 转引自彭超:《埃及剧变后科普特人问题透视》,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5 期。

④ Mariz Tadros, “Copts Under Mursi: Defiance in the Face of Denial”, *Middle East Report*, vol. 43, no. 267, 2013.

⑤ Bosmat Yefet, “The Coptic Diaspora and the Status of the Coptic Minority in Egypt”,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3, no. 7, 2017.

⑥ 笔者根据下列文献的数据绘制而成。Saad Eddin Ibrahim, and Ibn Khaldou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Cairo), *The Copts of Egypt*,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96, p. 16; J. D. Pennington, “The Copts in Moder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8, no. 2, 1982; Jennifer M. Brinkerhoff, “Diaspora Philanthropy: Lessons from a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Coptic Diaspora”,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 43, no. 6, 2014; Bosmat Yefet, “The Coptic Diaspora and the Status of the Coptic Minority in Egypt”,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3, no. 7,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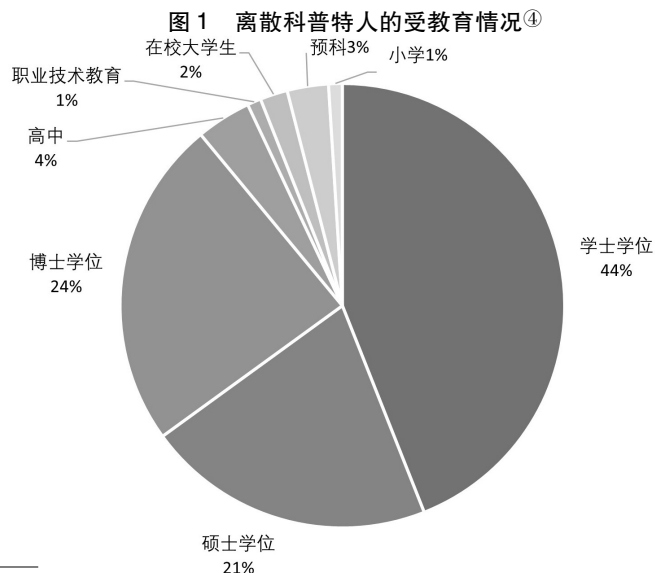
2013年埃及国防部部长阿卜杜·法塔赫·塞西上台,塞西政府致力于加强与科普特人的沟通与联系,加强与科普特教会的关系,并大幅简化教堂修建等相关事务的审批流程,拓宽了科普特人在埃及生存的社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普特人因被边缘化而被迫向外迁移的趋势。同时,塞西政府积极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拓宽埃及人向外迁移的区域,并为埃及人出国工作、留学、生活等合法迁移建立有效的机制和渠道,许多科普特人自愿到意大利、迪拜、中国等国家工作、学习和生活。因此,有学者将当代科普特人的外迁行动视为一种积极的“跨国生存战略”。^①

总体来看,埃及科普特人迁移离散的发展历程具有阶段性特征:21世纪以前科普特人主要因逃避埃及政治和宗教文化环境而被迫迁移,且该时期以科普特精英阶层外迁为主;21世纪以后随着埃及国际人口流动频繁,科普特人的外迁行动主要是由经济因素主导的自愿迁移,同时迁移浪潮波及整个科普特社区。从某种程度上讲,科普特人向西方的移民反映了科普特人对经济机会的把握,以及对埃及以外地区和国家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同时侧面折射出了科普特人对埃及政治伊斯兰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恐惧。客观而言,埃及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层面等“推力”因素,与外迁国家良好的社会条件、自由的宗教文化氛围等“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催生了科普特人离散群体。

(二) 离散科普特人的现状特征

通过对离散科普特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离散科普特人在人口构成、外迁目的地、类型和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特征。

从人口构成来看,相关研究表明,在居住在海外的科普特人中55%是男性,45%是女性,且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②在教育方面,如图1所示,89%的离散科普特人获得了学士及以上学位,其中44%为学士学位,21%为硕士学位,24%为博士学位。在职业方面,离散科普特人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构成,如医生、工程师、会计师、律师以及其他职业。^③总体来看,离散科普特人以男性居多,且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专业技术能力强。



① Lise Paulsen Galal, “Guardians of Contested Borders: Transnational Strategies for Coptic Survival”, *Kvinder, Køn & Forskning* 2-3,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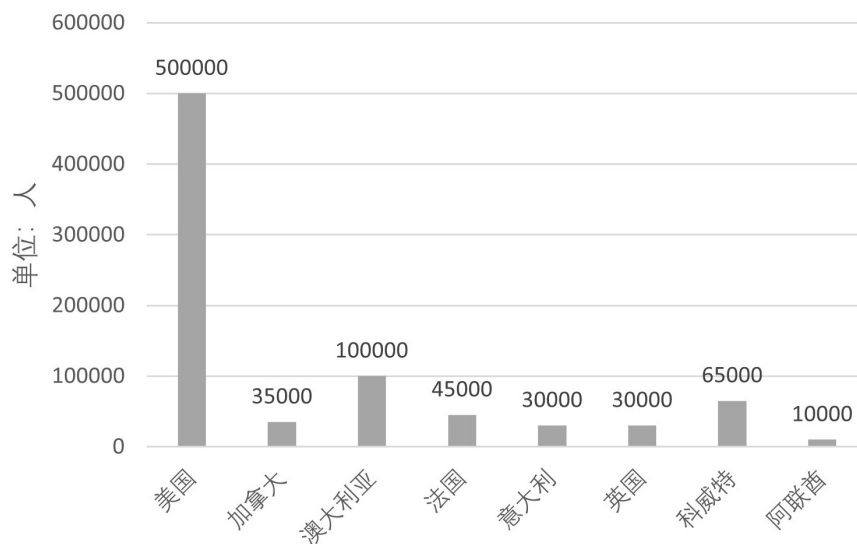
② Jennifer M. Brinkerhoff, Liesl Riddle, “General Findings: Coptic Diaspora Survey”,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p. 8.

③ 彭超:《埃及科普特人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④ Jennifer M. Brinkerhoff, Liesl Riddle, “General Findings: Coptic Diaspora Survey”,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p. 9.

从移居目的地来看,全球大部分地区基本都有科普特人的足迹。其中,除了科普特人的故乡埃及以外,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这三地是离散科普特人最多的地区,另有少部分科普特人分布在亚洲等地。在北美地区,最大的离散科普特群体生活在美国,科普特人已经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地区,意大利和英国是科普特人首选目的国。此外,在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家都存在较小的科普特社区。在澳大利亚,多数科普特人集中在悉尼、墨尔本,虽社区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①另外,在阿曼、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阿拉伯海湾国家也有少量的科普特人。除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部分阿拉伯海湾国家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虽不是科普特人外迁首选的目的国,却是科普特人迁移选择的潜在型迁入国。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与推进,孔子学院等机构大力推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埃跨国企业的建立和多层次的中埃留学生交流,促使部分科普特人来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在我国的台北、香港、广州和义乌等城市都有科普特教堂和社区。其中,义乌的圣马可教堂、广州的圣母玛利亚和大天使长米迦勒教堂、香港的圣托马斯教堂,以及台北的圣马可和圣玛丽教堂归属于统领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和全东亚的悉尼主教区。

图 2 21 世纪以来离散科普特人在主要国家的分布状况^②



从离散类型来看,离散科普特人以文化政治型和经济交往型为主。1997 年科恩在《全球离散》一书中提出了离散族群的类型学分析。他根据每一类群体迁移离散的原因将其划分为五大类离散族群,分别是受难型、劳务型、帝国型、商贸型和文化型。^③ 受难型离散指由于政治迫害等因素而离开母国的群体,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爱尔兰人和非洲黑人等古典离散群体;劳务型离散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的国际劳工;帝国型离散产生于殖民扩张时代,主要指从欧洲移居到殖民地的白人族群;商贸型离散指从母国到世界各地经商的移民,如东南亚的华商和亚欧各地的黎巴嫩商人;文化型离散族群则指具有共同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的国际迁徙群体,其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却以共有的文化与身份意识作为彼此联结的基础。与此同时,科恩认为不同离散类型之间并不

① Sebastian Elsasser, *The Coptic question in the Mubarak 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75.

② 笔者根据维基百科数据绘制而成。“Coptic Diaspor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ptic_diaspora; “Coptic America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ptic_Americans; “Coptic Canadia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ptic_Canadians; “Coptic Australia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ptic_Australians.

③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8.

是迥然有别的,很多离散族群具有双重性,甚至多重性。具体到科普特人,20世纪50年代科普特人向海外移民缘于埃及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排挤,催生了散布全球的科普特离散群体。科普特人所到之处纷纷建立起科普特教堂在当地传播科普特文化和宗教遗产,并以共同的科普特基督徒身份彼此联结。由此可以看出,科普特人的离散既不属于单纯的政治受难型,也不属于纯粹的文化型,而是同时兼具政治与文化属性的“文化和政治性离散”(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aspora)^①类型。值得注意的是,离散并不总是被迫迁移和流亡的结果。随着现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全球通信和现代航空旅行的兴起为人口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由此产生的经济交往型离散族群愈发普遍。从历史上看,埃及科普特人被边缘化的社会事实确已存在,但并非所有的科普特人都因受到“迫害”而迁移到海外。实际上,科普特人前往国外并不都是出于政治和宗教文化因素,出国留学、淘金者大有人在。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科普特人的移民网络越来越受到全球化商机、求学、就业等因素影响,呈现出更大范围的再移民趋势,并扩展至亚洲等其他地区,从而形成了经济交往型的离散群体。如果说文化政治型离散科普特人是基于埃及政治、宗教文化现实被动选择的产物,那么经济交往型则是科普特人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从离散方式看,随着海外科普特人规模和数量的扩大,科普特人所到之处纷纷建立了科普特教会分支机构以维系身份认同与联结。因此,教会是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普特人建立彼此联系的纽带,是离散科普特人凝聚族群情感的重要场所,也是离散科普特人信仰和价值观最为持久稳定的载体。正如科普特人所言:“教会就是母亲。”^②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全美国约有100座科普特正教会教堂,拥有30万成员,规模最大的科普特社区集中在纽约、波士顿、洛杉矶、芝加哥等大城市。^③此外,有数据表明2008年全球共有450座科普特教堂,其中某些教堂的信众来自2000多个家庭。^④另如表2所示,亚洲、欧洲、北美洲是科普特教会分支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南美洲也存在少量正教会分支机构。^⑤

通过以上分析与讨论发现,科普特人的离散迁徙并非一个随机过程,其中蕴含着某种潜在逻辑。换言之,离开埃及的科普特人并不是随意组合,而是在人口构成、外迁目的地、类型与方式中无形经过“严格筛选”具有跨国迁移和母国影响能力的人。^⑥具体来看,在人口构成方面,大部分离散科普特人来自社区的中青年阶层,他们文化知识水平较高、专业技术能力较强,该群体自身所携带的人力资本为其进行跨国经济活动与实践提供了资源;在目的地选择方面,大部分科普特人倾向于选择美国等“可渗透国家”(permeable state)^⑦作为外迁目的地,由此为离散科普特人发起针对母国埃及的政治游说活动提供了具有弹性的跨国环境;在离散类型方面,大部分居住在海外的科普特人以政治文化型与经济交往型离散群体为主,他们对于各种政策和动员策略的领会和理解能力较强,在经济、社会、政治、道德和信息获取方面的力量不可估量,是进行各种跨国活动和实践的主要参与者;在离散方式方面,教会作为离散社区的社会和精神机构,在维持各地科普特人的身份认同及与

①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2012.

② Paul Rowe, “Building Coptic Civil Society: Christian Groups and the State in Mubarak’s Egypt”,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5, no. 1, 2009.

③ Eliot Dickinson, *Copts in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942.

④ Ghada Botros, “Religious Identity As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Coptic Orthodox Immigrant Churche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19, no. 2, 2006.

⑤ 彭超:《埃及科普特人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⑥ Bun Song Lee, “The Influenc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Migrant’s Fertility Behavior in Camero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6, no. 4, 1992.

⑦ 相较母国埃及威权型的政治构造,大部分离散科普特人分散在诸如美国等民主型的国家中,沙恩将这类现居国称为“可渗透国家”。详见 Yossi Shain, “Ethnic Diaspora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9, no. 5, 1994.

其母国的社会文化关系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2 科普特正教会分支在全球分布情况(2016年)^①

亚洲	欧洲	非洲	北美洲	南美洲
西奈	奥地利	埃塞俄比亚	美国	玻利维亚
耶路撒冷	比利时	厄立特里亚	加拿大	巴西
黎巴嫩	丹麦	苏丹		
日本	法国	利比亚		
泰国	德国	突尼斯		
新加坡	匈牙利	阿尔及利亚		
马来西亚	意大利	摩洛哥		
印度尼西亚	荷兰			
巴基斯坦	西班牙			
中国 ^②	瑞典			
	瑞士			
	英国			

三、离散科普特人对母国埃及的经济影响

离散者与母国经济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沃布纳所言“散居者的想象力是由一种令人信服的共同道德责任感构成的,这种责任感体现在物质方面”。^③

首先,因离散而产生的离散者对其母国在经济上的巨大贡献是侨汇。^④就埃及而言,侨汇是埃及最大的外汇来源。如表3所示,在2005—2018年埃及成为侨汇汇入排名前列的国家,2010年为12.45亿美元,2015年为18.33亿美元,2018年达到28.92亿美元。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及海外科普特劳务移民的增加使侨汇成为散居各地的科普特人对埃及经济产生关键性影响的重要方式。其中,最大的汇款来自美国。据估计,埃及人从美国汇回9.56亿美元,占埃及人汇款总

① 彭超:《埃及科普特人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36页。

② 中国的科普特正教会主要分布在广州、义乌等内地城市,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

③ Pnina Werbner, "The Place Which Is Diaspora: Citizenship, Religion and Gender in the Making of Chaordic Transnationalis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28, no. 1, 2002.

④ 叶小利:《美国的离散者与其母源国的发展——全球化下国际移民与发展关系的重新解读》,载《嘉应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额的近 1/3。^① 另有相关研究表明,2008 年居住在美国的科普特人平均每年向埃及汇款 4890 美元,每月汇款超过 400 美元。^② 汇款的用途除了促进埃及国内教会和社区的经济发展以外,主要用于改善埃及侨眷的生活条件、教育和医疗水平。

表 3 2005—2018 年排名前列的侨汇汇入国^③ (单位:亿美元)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8 年	
中国	23.63	印度	53.48	印度	68.91	印度	78.61
墨西哥	22.74	中国	52.46	中国	63.94	中国	67.41
印度	22.13	墨西哥	22.08	菲律宾	29.80	墨西哥	35.66
尼日利亚	14.64	菲律宾	21.56	墨西哥	26.23	菲律宾	33.83
法国	14.21	法国	19.90	法国	24.06	埃及	28.92
菲律宾	13.73	尼日利亚	19.75	尼日利亚	21.16	法国	26.43
比利时	6.89	德国	12.79	巴基斯坦	19.31	尼日利亚	24.31
德国	6.87	埃及	12.45	埃及	18.33	巴基斯坦	21.01
西班牙	6.66	孟加拉国	10.85	德国	15.81	德国	17.36
波兰	6.47	比利时	10.35	孟加拉国	15.30	越南	15.93

其次,离散者对其母国的经济发展贡献还体现在引导居住国社区和教会对母国进行投资与慈善捐款方面。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内教会得到海外的经济资助,其中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经济援助^④和当地教会的资金支持。此外,相关研究显示,将近 27% 的海外科普特人表示愿意在埃及投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个人房地产等方面。^⑤ 与此同时,跨越国界的经济联系还体现在慈善捐款方面,主要包括善款、衣服、食物、电子产品等实物捐赠。如加拿大科普特援助基金会(Coptic Aid Foundation)于 2011 年 12 月完成了向在马斯佩罗事件^⑥(Maspero Demonstrations)中受伤的科普特同胞和烈士家属发放食物救济和善款捐助,其中捐赠善款达 5.8 万埃磅。^⑦ 该组织还专门设立了节日救助项目,如“复活节肉类配送”服务(Easter Meat Distribution),每年在复活节前夕

① Ayman Zohry, Barbara Harrell-Bond, “Contemporary Egyptian Migration: An Overview of Voluntary and Forced Migration”, University of Sussex,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and Poverty, 2003.

② Jennifer M. Brinkerhoff, Liesl Riddle, “General Findings: Coptic Diaspora Survey”,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③ 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移民报告 2020》,全球化智库(CCG)译,第 36 页。

④ 陈天社、彭超:《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人生存状况及困境》,载《世界民族》,2019 年第 1 期。

⑤ Jennifer M. Brinkerhoff, Liesl Riddle, “General Findings: Coptic Diaspora Survey”,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⑥ 马斯佩罗事件始于 2011 年 10 月,由埃及科普特人主导针对上埃及一座声称未经适当许可建造的教堂拆除而引发的示威活动。抗议者在马斯佩罗电视大楼前静坐遭到埃及安全部队和军队的袭击,导致 24 人死亡,212 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科普特人。

⑦ 详见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官网:<https://copticaidfoundation.org/docs.html>.

向社区贫困家庭发放节日鲜肉和糖果等。另外,一些离散科普特慈善精英通过筹集相当数量的慈善捐款,鼓励离散者在埃及的健康、营养和灾难救助等方面进行捐助,为家乡修建医院、学校和道路等。

最后,除了侨汇、投资和慈善捐款外,离散旅游以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建立起新的经济桥梁。毋庸置疑,旅游业是埃及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不仅能创收巨额外汇,而且能带动埃及社会经济活跃发展。埃及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设施的完善和项目多样化,吸引了大量海内外游客。据统计,1981—1982年埃及入境游客为140万人,在2000—2001年达到550万人次,^①其中也包括离散科普特人,他们通过回归旅游与祖国保持联系。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埃及移民自由化以后,埃及当局尝试以各种方式接触海外的移民和离散社区。部分离散科普特人被邀请回到开罗和亚历山大,并受到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接待。回到埃及后,他们游览开罗老城区的科普特博物馆和其他名胜古迹,并在悬空教堂、圣乔治教堂、凯瑟琳修道院以及其他科普特宗教历史遗迹朝圣。在旅行中,他们品尝当地美食和购买特产,为当地的旅游发展带来了活力。据统计,在1980—2000年间埃及财政年均旅游收入超过7亿美元,在2000—2001年上升为43.17亿美元,^②创下了历史纪录。2004年旅游业再创历史新高,入境游客多达810.3万人次,收入上升到61.2亿美元。^③

由此可见,离散族群对母国产生的经济影响是多方面的,既表现在通过流向母国的侨汇、善款改善侨眷家庭和社区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留守成员的消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减贫的作用和功能;又体现在通过投资、旅游等方式改善埃及的经济环境,增加就业机会,推动母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然而,离散族群对母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一方面大多数离散科普特人来自埃及社区的中产阶层,给埃及的汇款通常不会到达社区底层民众的手中。即使发送汇款的离散群体中有来自埃及农村贫困地区的科普特人,他们对于埃及社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沃特维克也看到了汇款带来的负面影响,指出汇款会引发社区不同民众之间的经济差距,形成一种经济依赖的文化习惯。^④在部分科普特人迁出地,离散科普特人长期的跨国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家乡的物质和文化景观,使迁出地与其他科普特社区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因此,汇款可能会增加母国社区民众间的经济差异,加大社区阶层分化。另一方面,大部分科普特家庭将汇款用于日常开支、住房改善和炫耀性消费,^⑤很少用于生产性投资。据笔者调查发现,多数留在埃及的科普特侨眷家庭将汇款用于购买食物、衣服和耐用消费品,也有少部分家庭用于购置房产、土地等,仅有很小一部分用于储蓄以及投资生产,使汇款对埃及社区的影响具有一定局限性。

四、离散科普特人对母国埃及的政治影响

离散是一种认同政治的现象,是散居海外少数民族政治诉求的隐喻。^⑥对于科普特离散群体而言,主要是个人或组织通过游说方式争取在埃及的政治参与,继而影响埃及的族群政治生态。离散科普特人在埃及政治实践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但从目前国内外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离散科普特人对埃及的政治影响多呈现消极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① 杨灏城、许林根:《列国志: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3页。

② 埃及驻华使馆新闻处:《埃及新闻总署·埃及二十年成就1981—2001》,2002年,第12页。

③ 杨灏城、许林根:《列国志: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5页。

④ Steven Vertovec,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and Modes of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8, no. 3, 2004.

⑤ Ninna Nyberg-Sørensen, Nicholas Van Hear, and Poul Engberg-Pedersen,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Evidence and Policy Options State-of-the-Art Overview",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0, no. 5, 2002.

⑥ 范可:《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载《思想战线》,2012年第1期。

其一,离散科普特激进分子的政治活动激化了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离散科普特人建立了诸如美国科普特人联盟、加拿大科普特人联盟等社团组织,其中部分组织成员成为活跃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激进分子。^①他们努力将自己刻画成诸如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的受难型离散族群,并受法老主义思潮与“迫害论”的影响,宣扬与埃及穆斯林截然不同的民族特性。在此情景下,埃及国内的穆斯林将离散科普特人视为新的“十字军”,科普特人在埃及的社会地位和处境不断被边缘化和妖魔化,从而激化了埃及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此外,海外激进的科普特游说团体还通过互联网公布埃及国内针对科普特人暴力事件的相关照片与视频,同时配有煽动性的语言文字,并将科普特人描绘成无辜的受害者,而将引发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归咎于“穆斯林狂热分子”。在族群分裂气氛的渲染下,埃及科普特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争执不断升级为族群冲突的暴力事件。由于海外组织的煽动,据统计2000年的族群冲突导致19名基督徒和1名穆斯林死亡,40多人受伤,且大部分科普特基督徒的房屋和商店遭到袭击,^②暴力事件持续了三天,并蔓延到附近的村庄。不仅如此,美国科普特人协会还将族群冲突事件解释为埃及政府迫害科普特族群的罪证,并在网络上以“埃及政府鼓励迫害科普特基督徒”为标题讨论此事。因此,有学者认为离散科普特人是埃及民族团结倡议的一个重大阻碍,在大多数埃及穆斯林眼中他们是“麻烦制造者”。^③

其二,离散科普特人的极端政治诱发了海内外科普特社区的紧张关系。随着科普特人大规模离散行动的纵深发展,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问题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中的关注度陡然提升,由此推动了科普特问题的国际化。以美国科普特人协会为例,部分在美国的科普特人通过美国报纸、媒体发布关于科普特人的权益和身份问题的文章,将科普特问题提上美国国会的政治议程,极力推动科普特人问题的国际化。同时,美国当局也推波助澜,利用人权问题和公民身份问题,并用经济援助手段干预埃及的族群政策和立场,致使科普特问题逐渐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内外科普特人的诉求并不一致,埃及科普特人及其教会认为“科普特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科普特人的问题只能通过本土改革来解决,拒绝西方势力对其进行干涉。教皇谢努达对美国科普特人试图将科普特人描述为受难型离散族群公开地表示担忧和不满,并强调这些激进分子只占离散科普特人的一小部分,他们不能代表教会和更广泛的科普特社区,并坚持不使用“迫害”一词。他还直接呼吁离散科普特群体保持对拥有埃及人身份的自豪感,认为他们应当亲身体验当今埃及的基督徒-穆斯林关系,并积极参与促进埃及国家利益的活动。相较之下,离散科普特激进分子更加强调“科普特属性”,而埃及科普特人则强调“埃及属性”的国家团结。^④在双方诉求不一致的情况下,埃及国内的科普特人与离散科普特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复杂化且相互怀疑,充满矛盾情绪,诱发了埃及海内外科普特社区的紧张关系和教派冲突。

当然,离散科普特人的政治活动并不一定都是消极的。在某种意义上,离散科普特人针对母国埃及的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和埃及族群之间关系的作用。如针对2011年10月发生的马斯佩罗事件,居住在巴黎与维也纳的科普特人对受伤与死亡的同胞表示了声援和哀悼,发布带有

① 段九州:《科普特问题和埃及宗教冲突的制度性根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3期。

② McCallum Fiona, Mahjoob Zweiri and Emma C Murphy, “Religious Diaspora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Communal Relations in Egypt”, in Mahjoob Zweiri et al. (eds.), *The New Arab Media: Technology, Image and Perception*, Ithaca Press, 2011, pp. 81-101.

③ 王志慧:《埃及申诺达三世时期的科普特人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④ Bosmat Yefet, “The Coptic Diaspora and the Status of the Coptic Minority in Egypt”,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3, no. 7, 2017.

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符号或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人一起示威游行的照片,并在照片上配上了诸如“穆斯林和科普特人是一只手”“我是一个反对宗教分裂的埃及人”等标语,^①鼓励穆斯林和科普特人相互团结,强调事件对埃及所有公众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塞西总统上台后在议会中增加科普特人的比例,放宽科普特教堂建设和翻修的条件,并在节日庆典参加科普特东正教的宗教仪式。塞西被离散科普特人视为埃及最受欢迎的总统和埃及基督徒的保护者,来自离散科普特人的极端政治活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促进埃及族群团结、友好发展的政治活动。美国游说团体曾表示:“我们在埃及争取平等的斗争是和平的。我们从来没有鼓励甚至纵容任何分裂主义的想法,我们相信埃及是所有埃及人的福地。我们坚信对科普特人有利的就是对埃及有利的,对埃及有利的就是对科普特人有利的,因为科普特人的过去、未来与埃及不可分割。”^②

五、离散科普特人对母国埃及的社会文化影响

离散族群与母国的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相关。科普特离散社区是基于社团组织而发展起来的,因而科普特人往往通过跨国社团组织与母国埃及保持强烈的社会文化联系,由此推动埃及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交流。

离散科普特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建立了科普特孤儿、牧羊人与圣母之光、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和多伦多圣母玛丽协会等对埃及社会发展影响力较大的慈善救助组织,进而推动母国埃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与进步。1988年成立于加拿大的科普特援助基金会(Coptic Aid Foundation)^③关注埃及国内科普特贫困家庭、孤儿和寡妇群体,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和资金支持。同时,号召科普特人发挥务实勤劳的优良传统努力开创美好生活。此外,该组织还向科普特人提供资金贷款,支持小型项目创业,并为科普特青年提供就业岗位等服务。^④迄今为止,该组织的救助范围不仅涵盖上埃及各地区,还包括了开罗区和三角洲区等,并将其援助款项延伸至埃及各个小城镇,其援助范围几乎覆盖埃及全域。据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官方统计,截至2009年12月31日基金会已经向埃及20多个地区提供了援助,其中上埃及地区为14个,其余为下埃及地区和中部分地区。^⑤美国的“科普特孤儿”(Coptic Orphans)组织为埃及国内数以千计的科普特孤儿提供优质的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该组织还推出了“不孤单”(Not Alone)和“珍爱女孩”(The Valuable Girl)计划。其中,“不孤单”计划在埃及的700多个科普特村庄中为失去父亲的科普特儿童提供志愿服务和高等教育的奖学金。^⑥“珍爱女孩”项目为埃及国内的科普特女孩和年轻女性提供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据统计,超过15000名科普特女孩和青年女性从该项目中获益。^⑦澳大利亚的“牧羊人与圣母之光组织”(The Shepherd and Mother of Light,简称SML)为科普特社区的底层民众提供住房、就业指导 and 机会。^⑧此外,成立于2003年加拿大圣母玛利亚和阿塔纳修斯教会的下属

① Lea Müller-Funk, “Diaspora Mobilizations in the Egyptian (Post) Revolutionary Process: Comparing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Paris and Vienna”, *Journal of Immigrant & Refugee Studies*, vol. 14, no. 3, 2016.

② Lori A Brainard, Jennifer M. Brinkerhoff, “Sovereignty Under Siege, or a Circuitous Path for Strengthening the State? Digital Diasporas and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29, no. 8, 2006.

③ 详见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官网:<https://copticaidfoundation.org/>。

④ 白韶璞:《埃及科普特社会组织及发展趋势》,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4期。

⑤ 详见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官网:<https://copticaidfoundation.org/>。

⑥ 详见科普特孤儿官网:<https://copticorphans.org/>。

⑦ 详见科普特孤儿官网:<https://copticorphans.org/>。

⑧ Coptic Orphans, Coptic NGOs and Nonprofits Directory, Virginia: Coptic Orphans U. S.-Headquarters, http://www.migration4development.org/sites/default/files/Coptic_NGOs_Directory_-_First_Edition_1.pdf.

组织多伦多圣玛丽协会(St. Mary's Society of Toronto)和2007年成立的照拂贫困科普特人(Care Needy Copts),常年致力于为多伦多和美国的贫困科普特家庭和儿童提供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服务。更为重要的是,海外科普特慈善组织作为埃及民间救助力量的一部分,通过在居住国学到的成熟的公益慈善理念和机制,开展志愿服务和慈善活动,为埃及同胞提供理念、技术、资金和知识支持等,帮助埃及政府在改善科普特社区弱势群体的生存、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推动埃及公益慈善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表4 离散科普特人的慈善救助型社团组织^①

社团名称	成立时间	分布国家	主要创办人
科普特孤儿	1988年	美国	内尔米恩·里亚德
科普特援助基金会	1988年	加拿大	萨阿德·加利
牧羊人与圣母之光	1995年	澳大利亚	塔瓦·德罗斯
多伦多圣玛丽协会	2003年	加拿大	安杰洛斯·萨阿德
照拂贫困科普特人	2007年	美国	莱拉·西东姆

不仅如此,海外科普特社团组织将离散科普特人聚集在跨国社会空间内,向母国埃及输送新的思想观念,进而促进埃及社会文化的交流与更新。从国家层面出发,海外科普特人创建的社团组织实现了母国埃及与居住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大部分海外科普特社团组织创立于北美、欧洲等西方国家,组织成员通过社团活动将西方的价值观和多元文化主义观念输送给埃及,继而影响埃及国内的社会规文化和国民观念。值得注意的是,科普特人的离散行动不仅减少了埃及社区的人数,而且降低了其在埃及民族多样性发展中的潜力。阿拉伯人入主埃及以来,埃及形成了以穆斯林为主流,其他群体为辅的多族群文化生态环境。然而自1952年开始的科普特人的离散外迁活动,导致了埃及族群文化多样性的流失。基督徒作为中东地区的非穆斯林群体之一,是多元主义的重要力量。因此,科普特离散群体通过社团组织形式对母国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多元化的消逝趋势,给埃及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推动了埃及文化的发展。从社会层面出发,在参与母国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中,海外科普特社团组织将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普特人与埃及科普特人联系在一起,实现思想、观念、文化、行为的跨界传输与转换,为社区多元化文化景观的建构创造了条件。如由迈克尔·穆尼尔于1996年创立的美国科普特协会(U. S. Copts Association)和肖基·卡拉斯于1992年建立的美国科普特人联盟(American Coptic Union)积极接触埃及的科普特人及其社区,强调科普特历史文化在埃及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促进埃及科普特人公民意识、社区意识和社会文化理念的革新。与此同时,埃及科普特社区获得了新的观念与服务理念,不仅丰富了科普特社区的多元化公共空间,还赋予社区同伴和亲属为埃及社会文化发展作贡献的能力。另外,由于科普特离散群体经常迁移,他们视野广阔,能接触到不同族群的文化,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因而更有可能成为社区文化多元化的推动者,实现社区传统文化和习俗的革新。

^① 笔者根据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官网(<https://copticaidfoundation.org/>)、科普特孤儿官网(<https://copticorphans.org/>)、牧羊人与圣母之光官网(<http://www.sml.org.au/>),以及“科普特孤儿”(Coptic Orphans)、科普特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名录(Coptic NGOs and Nonprofits Directory)、弗吉尼亚州科普特孤儿美国总部(Virginia Coptic Orphans U. S. - Headquarters)的信息绘制而成。

六、结 语

全球化的发展使跨国移民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常态现象。离散族群是国际移民的特殊群体,同时兼具移民性和族群性。从历史上看,公元 1 世纪圣马克将基督教带入埃及,科普特人皈依基督教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科普特族群及其社区在埃及的处境跌宕起伏,时好时坏。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纳赛尔推行的国有化运动打击了由科普特人主导的大型企业,将科普特人在埃及的地位和影响力滑向边缘,导致科普特人开始向海外移民。迄今为止,在全球化与国际迁移浪潮的裹挟下,因经济和文化因素迁往海外的科普特人越来越多,并在全球各地聚集形成科普特离散社区。移民海外的离散科普特人虽身居异乡,但由于其历史、命运和兴衰与埃及大地紧紧相连,^①因而理所当然地与埃及家园保持强烈的联结,进而影响母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随着离散科普特人口数量和规模逐渐扩大,海外科普特人与埃及母国的关系波澜起伏,伴随着国际社会政治环境和埃及国内外政局的调整而不断变化。再者,海外科普特人激进的政治活动和游说策略致使科普特问题逐渐国际化和复杂化,因此,亟须给予埃及海外科普特人一定程度的关注与研究。

Abstract The Copts are the largest ethnic minority in Egypt and the largest Christian group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5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sser's nationalized economic policies and Arab nationalism, the Copts began to emigrate to the West and formed relatively large Coptic diaspora communities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outside Egypt. So far, the Copts abroad from Egypt have presented a group characteristics that needs urgent at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composition, they are mainly male middle class with high level of cultural knowledge and strong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cap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spora destinations, most of the overseas Copts mainly reside in North America, Australia and Europe countries, and a small number of them work and live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ay of diaspora, the Copts abroad have established Coptic churches wherever they go to maintain their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ti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spora types, the Copts have formed diaspora groups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ype and economic exchange type in thei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lthough liv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 overseas Copts have never ceased to pay at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and influence the affairs in various fields of their native Egypt. On the one hand, they have established economic ties with Egypt through remittances, investments,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tourism,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participated in Egyptian political activities through political lobby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overseas Copts have sent new ideas and new concepts to Egyptian society throug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y as well as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hanges in Egypt.

(任敏,博士研究生,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银川,750021)

[责任编辑:于 红]

^① 杨灏城、朱克柔:《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2页。